

近代中国

外交史资料辑要

上卷

蒋廷黻
编著

近代中国

外交史资料辑要

上卷

蒋廷黻
编著



蒋廷黻简介

蒋廷黻（1895－1965），中国著名历史学家、外交家。湖南宝庆人。1911年赴美留学，1923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当年回国，任南开大学第一任历史系主任，与梁启超等人为南开历史学科奠基。1925年调入清华大学，任历史系主任，在任期间改革清华大学历史系，建立起全国一流的史学阵营。1932年，与胡适等人共同创办《独立评论》杂志。1935年受到蒋介石的赏识，弃学从政，任国民党行政院政务处长。1945年被任命为中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1961年任台湾驻美“大使”兼“驻联合国代表”；被誉为国民党官员中“最知外交的人”。1965年10月9日在纽约去世。

编者告白

中西出版社，莫不以“文库”或“丛书”为立社之基。如吾国“四部丛刊”之于商务印书馆，“四部备要”之于中华书局，而西洋则有“企鹅文库”、“世界文库”、“七星文库”等等，日本亦有“岩波文库”，皆个中翘楚，风行一时。观今鉴古，藏往知来，故吾社遂有“东方文库”之编集。启动之始，有如下告白。

一曰以立社为宗旨。一社之成长，当有连续性，一步一脚印，清晰可辨。本文库正是此种成长轨迹之记录，俾使本社所出之书，有完整链条而不断裂，有完整画面而不破碎。本文库不仅是立社之本，实又为本社之成长日志。

二曰以精品为追求。图书之撰，有下品，有中品，有上品；下品如快餐读物，上品如中西经典。又有精粗之分，精品如“四部丛刊”，粗品如“四库全书”。本文库自当以上品、精品为追求，所收各书，既是严肃认真之作，又为确有识见之作。

三曰以社会科学为范围。今之学科分类，源自西洋，以所谓“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为两大类，前者如文史哲，后者如数理化。本文库所收各书，以社会科学为限；如文学、史学、哲学之作；如社会学、心理学、逻辑学之作；又如政治学、教育学、宗教学之作等等。科学史、科学哲学之类，不纯属自然科学者，亦

在收录之列。

四曰以学术与文化为旗帜。本文库所收各书，以学术文化著作作为限，可以是专著，亦可以是同主题论文集；可以是一个人独著，亦可以是多人合著；可以是中文之新撰，亦可以是外国之译作；可以是境内人士之作，亦可以是境外华语之作。

五曰以开放为特色。时间上，虽以当代学者为主，亦可前推后延，上溯晚清以降，甚或晚明以降；下及晚辈后生，呈无限开放之态。空间上，虽以吾国学者为主，但不拒绝西洋、东洋之优秀作品，呈无限开放之态。编辑上，不限体裁，不限文体，不分类，不编号，先有先出，亦呈无限开放之态。今之人继前之人，后之人继今之人，再后之人又继后之人，可以一代代，一辈辈延续下去，无有终时。

一人之成长，有一人之特别轨迹。一社之成长，亦有一社之特别轨迹。“东方文库”将是此特别轨迹之记录。十年后，五十年后，百年后，本文库将在中国出版史上留下印痕。

《论语·子路》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古老之中华民族，已走过“庶矣”之阶段，正走在“富矣”之路上；“教之”之时代，迎面扑来。“东方文库”将不辜负时代重托，誓在“教之”之时代里，有所作为，建功立业。

蒋廷黻的“中国想象”与理性诉求

秦燕春

他是一个简单的人，不复杂的人。他像一头牛，充满着笨劲，一直往前冲，眼睛只往前看，这使他能够排除万难而达到他的目标。这是他的可爱之处，也是他成功之处。

据说这是在联合国与其共事过的一位澳洲外交官对蒋廷黻的写照（参见傅国涌《蒋廷黻文存》前言），但是不是一眼看上去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湖南人”？蒋氏本人为邵阳籍——民间传说此地民人乃是湘人“霸蛮”的样板——蒋廷黻在回忆录中也自承：“邵阳人均以勇武自负。我和哥哥年幼时，父亲就为我们请了一位拳师，教我们防身术。很多武林故事在乡间流传，其情节酷似电影中美国西部武打片。”

这些年颇受所谓“现代文明”熏染的人们很愿意将“私德”、“公职”分而治之。据说是可以两不碍，要给私人生活留下足够的自由空间，即使这种自由是“消极自由”。号称“国土无双”的民国知名史学家、外交家蒋廷黻（1895 - 1965）生命后十八年，亦曾颇在私人生活上耸动视听：他的次妻沈恩钦乃是自己下属的曾经夫人，桥牌桌上暗结情思，而与其同学美国并生育了四个儿女的发妻唐玉瑞则不承认这第二次婚姻的有效性、一直认为蒋犯有“遗弃家庭”罪（因其第二次婚姻缔结于墨西哥，于中、美两国皆不合法度），唐并约请中美双方律师取得法律支援与“名义上的胜利”（然与丈夫实质性相伴的依然是沈），甚至为此要求联合国“管管自己家

务事”而不要只忙于全世界“维和”。更有甚者，据说蒋于纽约每在外交界、学术界有演讲、开会、酒叙等活动，其发妻必然不请自来并前排就座——坚忍不拔提醒“陈世美”自己不屈不挠的存在。这滑稽的一幕一直持续到蒋廷黻永辞此世，据说在纽约大教堂蒋氏追思礼拜中唐、沈两位妻子依然联袂出现、共坐前排分在左右，好在还均守护礼仪、彼此平和，与这同一个男人平安了结今生这笔糊涂账。

他人帷幄家务事，是非清浊外人自是难以置喙，只是，此事首尾若此至少说明蒋廷黻“性情”之奔放、我行我素乃至“不拘小节”，与今世学者对其“理性主义”、“现实主义”的盖棺论定似乎颇为两截——除了他长达11年的美式教育，以及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中国驻苏联大使、台湾蒋介石政府驻联合国大使、《独立评论》发起人、“新式专制”鼓吹者等系列身份……或者我们还不得不考虑考虑他的“湖南脾气”？另外一对现代文化史上的留学生夫妇任鸿隽、陈衡哲，祖籍湘省的陈氏性情激烈之时，四川籍丈夫便常轻语她“湖南脾气又犯了”。蒋廷黻的“湖南脾气”在政界似乎也很出名。据说唐德刚先生曾经嘲谑蒋廷黻一口邵阳腔行遍天下绝不改易——蒋弃学从政之后陆续使苏驻美，是名副其实“行遍天下”——甚至他的英语也是湖南味的（参见吴相湘《风云际会下的书生》）。这固然也在证明着蒋廷黻浓郁的“乡邦”特色，但统观一部《蒋廷黻回忆录》，我却依然非常注意这个身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的湘省学人那副“看中国”的特殊手眼：身处美国的蒋廷黻无论讲起湖南还是中国，他的“记忆”中那份鲜明的“批判精神”与“理性诉求”引人注目——出自一位以“血气”与“任勇”著名的湘籍学人，这是一种令人特殊的感动。要知道，初次造访伦敦（1935年）已经四十初度的蒋廷黻因为不喜欢伦敦人的单调古板，甚至异想天开“想用针戳戳他们，看看他们是不是有血”、“房子古老，取暖设备不足，窗子噼啪乱响”的伦敦“最好是遭一场天火，烧它个片瓦无存，重

新来过”——这些让人忍俊不禁的牢骚，岂不正见证了蒋廷黻的性情本有的激烈？但，他真的是那个时代最有理性精神与追求的政治人之一。

蒋廷黻是在湘潭美国教会学校（益智中学）读书期间正式受洗入会的基督徒，其前期教育也由教会学校完成，但他回忆湖南民间宗教生活依然有着中国人特有的平和与宽容：

家父和他的两个哥哥都崇奉儒家思想，换句话说就是对释、道两家不太有兴趣。可是我的祖母却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前面说过，在我们祖先堂中有一张供桌，桌上供着一个神龕，却没有供任何佛像。……那时，在信仰上一方面是我的父亲和伯伯，另一方面是我的祖母，使我左右为难。父亲他们虽然不积极反对信佛，但往往斥信佛为迷信。因此，我只有徘徊在信与不信之间了。据我所知，祖母并不想要他的儿子们也信佛。另一方面，家父和伯伯们在地面前也不对佛表示不敬。他们的行径，实在是信仰自由的最佳榜样。至于崇拜祖先，祖母和他的孩子们却是看法一致的。

以后的行文中，蒋廷黻曾经提及湖南乡下因为“无知和对洋人的仇恨”导致的“造新神”运动。当他忆及幼年乡下生活，平淡中自有威严与尊贵，“平时，父母对我们管的很严。他们自己也自律甚严，以身作则，示意我们将来要好好过日子。好好做人”。还有蒋氏那位以寡妇再嫁之身而持家甚为庄肃而能将“湖南人的亲切与体贴”表现得“无遗”的继母：“她对我们照顾的无微不至。她虽严厉，但从未责骂过我们；她用说服的办法使我们改过。有时我们不听话，她使我们自惭形秽”。蒋之父辈之间的关系也很让人欣慰：当他的伯母抱怨廷黻兄弟读书的学费占用了家族公产，他的父亲便坚决表态要孩子辍学去店中当学徒、他的伯父则坚决不允妻子妄议此事——如果有必要，他愿意卖掉私田供给两个富有才华的侄子读书。这位伯父可以主动将杰出的侄子送进长老教会学校读书，也并不激烈反

对教会，但却能够使得侄子自觉“感到传教在中国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教义实在比不上中国文化”。蒋廷黻认为自己居住在宝庆府邵阳以北三十里的先人和家族至少在他出生时“没有受到现代化和外国的影响”（尽管经营商业的蒋家显然较之一般乡民更为开化与通达，例如他们区别于“守财”的享受追求）：“他们生存的天地是中国式的。但他们是否能够代表整个古老的中国，我却不敢说。”

我们隔着岁月的风烟，难道不是依然从这位据说日后的“全盘西化”者笔下感受到对于生命、生活、生存的温柔、简单而朴素的爱？这个“地方事务都是由亲族组织、乡里组织来处理”、广袤的辖区中经常“从未看到过县府人员，甚至连一个警察都没见到过”的“中国最大的县份之一”（邵阳），出现在身在纽约的用英文追忆家乡的蒋廷黻嘴中，分外耐人寻味：

就我记忆所及，大体而言，乡间的治安是很好的。
……有一年大旱，为了谁家先从水塘汲水的问题发生争执。
依照习惯和传统，凭地契决定先后次序而非根据法律。也没有书面契约。借贷、利息等也都依照习惯和传统。

甚至地主和佃户之间也很能“互信”，例如一个8岁的孩子就足以作为地主的代表而完成整个的收租过程而不必担心被佃农欺骗。尽管通通将乡下生活民俗信仰种种归为“迷信”依然印证了蒋廷黻经受的现代科学文明洗礼，他却坦然承认“迷信比警察的力量还大”：“回想起来，可以说大多数乡下人都是工作苦，生活俭朴。他们既不感到满足也不感到不满足，都过着和他们前辈相类似的生活。大地主们虽然在乡间为人所嫉，但他们的生活标准和情趣却不太令人羡慕，至少对现在这一代人说是如此。由于分家，很容易使大财主家道中落，甚至囊橐不继，但，另一方面，欲想发财却是难上加难。对乡下人说，没有太大的发财机会”。这种相当克制、缓慢、余绪的乡村生活，应当是传统中国“平时”的写实，包括它课程与教法均“多少个世纪来都没有变过”的私塾教育。1901年以前湖南连一个外商、传教士、使领人员都没有。湖南是当时抵制外货最久的

省份之一……而到了1906年前后，长沙城内许多商店已经“陈列着五光十色的外国货”例如钟表、煤油灯、玻璃器皿。“光亮、柔软、舒适而且绝对防水”甚至“可以穿在中国鞋外面”的胶鞋受到年轻人的追捧，几乎人手一双。男女老少都认为汽水“神奇而可口”。基督教和天主教的教堂更是有了好几所。长沙的学生尤其毛泽东曾经就读的省立师范，不知何时开始纷纷流传一句口号，“中国若是德意志，湖南定为普鲁士”。蒋廷黻认为传扬这句话的人中对于“普鲁士主义的真意何在”并不了了，它只代表了一种弥漫的情绪，“革命令人感到迷惑、浪漫、兴奋”，这种“极端的保守主义转变成极端的激进主义”后来在同为湖南人的沈从文那里曾经有过文人式样的反思。然而“中国大乱人生悲，今有湖南何惧为”，湘人的“任勇”与自负显然是一种群体气质，早在著于1903年的《菴腾歌》里，这被视为凿七窍而死的混沌后身的“菴腾子”就被近代中国另一位著名湖南人章士钊（1881—1973）宣称为“今当生自长沙里”。著于民国十一年（1922）的《草新湖南案成放歌》，时章士钊正在旅德，“愚居柏林，去国甚远，于政争无与，因视天下事无不可为，草治湖南新案，拟返里试行之。诗性忽发，且成长歌一章。”（《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二十四号《孤桐杂记》）开篇历数了同时以及历史的湖南杰出之士、同样在针对湘潭人杨度（1874—1931，字哲子）那几句中提到了上述典故：

同时哲子抵掌起，少年之歌复成矣。

斯巴达与普鲁士，健儿闻风心窃喜。

著名的长沙明德学校1906年在年仅11岁的蒋廷黻眼中，较之私塾其区别犹如“老虎与猫”。明德规模甚大（小学部约有四百人），建筑现代化，木地板玻璃窗，学生着制服，类军事化管理，有体操课和游戏时间，校长及其代理人训话内容都是“要我们爱国”——其理由则与今日学界某类强调并无二致：“中国是文明大国，但被东西列强压迫”。总之明德是“一所充满革命气息的学校”，小学生在校内也会谈到自由、平等，有时攻击传统的管教方

式，明德甚至是“革命分子的秘密机构”，但却有“好几个皇帝任命的湖南高级官员和地方绅耆都爱护那所学校”——读到下文大清政府的邮局居然会将国民党在租界印发的“反动”宣传品如实运送到它治下的国民手中：我们的确要惊叹或怀疑“中华帝国”曾经的奇怪松散的极权特色。日后蒋廷黻对于政治选择的认识与坚持、对于“殖民或帝国主义并不深恨”，很可能根本更在他希望“改良中国生活方式，根除无效率、涣散的习性，就能建立有效率的生活方式”。

基督徒蒋廷黻的受洗过程并不顺利，尽管日后在学理上他依然关注基督教、天主教对于中国近代发展的影响。湘潭益智中学的《圣经》课很像一场巨大的灾难，因为“中文译得不好”：“《圣经》怎么能用这种粗鄙的文字”？

星期天上主日学和进教堂比上圣经课还令我讨厌。在教堂坐在硬板凳上身体精神均感痛苦。我能在益智的五年漫长岁月中和在教堂里保持安静，实在是家庭教育和乡村教育训练我尊敬老师和长辈的结果。

至于最后的受洗，虽不敢说必然与蒋廷黻渴望留洋读书有关，但教会工作人员的“热心以及对社会福利事业的关怀”几乎是彼时投身“异教”的中国人的共同反应：热心公益的宗教必然是一种好宗教。这样一种“在世”理由实在当感谢中国人普遍的儒教底蕴。犹如蒋氏在美国就读期间依然坦承自己“不太重视最后的安慰”、“不喜欢隔绝的、一元化的世界”，他甚至开始“对整个教会活动都感到怀疑”——1930年代出使莫斯科的蒋廷黻居然意识到斯大林的问题可能有一因素在于“人类潜意识中也有某种隐藏的力量，骗使人类去从事摧毁人类的工作”：一生言简意赅的他未尝留下任何试图探索形上世界的文字，这句话却是大有深意存焉……暮年蒋氏则在回忆录中对自己的信仰态度给出了如下“合理的解释”：

人民的信仰是传统中最内层的部分。宗教信仰是传统

的。没有传统，特别是反传统，就得不到精神安慰。为求精神安慰，每个人都应该有某种程度的宗教信仰。任何破坏这种共同认识的企图，都是一种精神上的损害。

这位受洗教徒甚至直言“传教可以视为十足的精神侵略”——此言还是放诸他的“民族主义”诉求中来理解方更有着落，当然这是针对“乡土观念和氏族观念”的“民族主义”。只是不知他如何在这类问题上具体处理“传统”中的“习性”例如“无效率、涣散的习性”。犹如他从政期间同样感叹中国对于“习惯”（例如喜欢“推敲文字”）的滥用：“中国的问题是观念问题。”或许因此，尽管1923年夏天父亲去世自美返国刚刚半年的蒋廷黻办理丧事之时没有请和尚念经，认为“完全是迷信”，而是出钱修缮庙宇并以之办学，但若干年后，任职清华的他听到所谓父亲魂灵附体的传言，其反应却是“即刻寄钱回家给父亲念经”。并在十二年之后祖母去世之时，完全采用了湖南乡下例行惯用的发送方式，“依照佛教仪式在祖先堂念经，整个丧礼可以说极尽人间的豪华和精神上的安慰”，因此“大约用掉三百元，卖了三亩家田”。蒋廷黻的“入乡随俗”中并无勉强的成分。我相信这同样是他回归中国生活的一种“精神着陆”——他并不总是一头“瓷器店中的猛牛”。

关于蒋的书生从政、新“极权论”、“新史学”开山或“执中国近代史研究、外交史研究之牛耳”、他的民族主义观点、他与其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导师海斯（Carlton J. H. Hayes）、邓宁（William A. Dunning）的思想渊源……最近若干年似乎广受关注，兹不赘言。尽管如此，当读到如下句子：

蒋廷黻刚到清华时，曾找公认的汉代史权威杨树达先生教汉朝历史。他说：“杨教授，你能给学生和我正确扼要地讲一讲汉代四百年间都发生过什么事，汉代重要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变化如何吗？”名闻天下的杨先生居然面有难色，表示自己从未想过这些问题，书中没有讨论过。

留美十一年的蒋廷黻吃惊地发现，西方的史学经过长

期积累，早已形成一套大家共同接受的历史知识。但中国的史学只有丰富的史料，对历史缺乏一个整体的理解和共同的规范。每个人都是专家，研究都是从头开始，往往重复别人的工作，进步有限。（傅国涌《蒋廷黻文存》前言）

读到如上句子，我的反应也是“吃惊”，吃惊我们人类对于历史追求“整体的理解和公共的规范”的雄心与魄力。但此际杨先生的“面有难色”似乎是傅先生的丰富想象，《蒋廷黻回忆录》中杨先生的反应很平淡——这才是“杨先生”本色。且发出此问的也并非蒋廷黻本人。尽管蒋廷黻在清华六年任职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等职务期间的大刀阔斧的确改变“治史书而非史学”的“传统研究方法”，据说形成“与王国维、陈寅恪迥然不同的另一个新的清华学派”——“他们能够告诉我们中国从什么地方发源，又向何处发展，最后定居在什么地方”——蒋廷黻一定想不到，如今这个“微（博、信……）时代”，要命的倒是似乎任何“（博）主”都能随随便便“告诉我们”：“中国从什么地方发源，又向何处发展，最后定居在什么地方”。李济（济之）先生同样说过，蒋廷黻著作虽然不多，但他“为中国近代史一建立了一个科学的基础，这个基础不只是建筑在若干原始材料上，更要紧的是他发展的几个基本观念”。这是一个“观念”不断翻新并因此让人无法把握生命、生活与生存本来面目的时代？！但我们绝不必苛责那代学人的价值判断，毕竟只“治史书”的传统中国也非毫无问题完美无瑕，西方国家“经过若干个世纪的科学的彻底的研究”所整合出的“一套能为大家共同接受的历史知识”亦非毫无价值——一无是处。只是，面对蒋廷黻那代人的现代追求，例如因为酱油酿造“依照旧法大豆发酵过程需要半年”，他试图请南开和其他地方的化工人员研究一套加速发酵办法，“用某种化学方法促成发酵过程”并视之为“知识分子可以循此途径为中国生产方面做出贡献”、“只有用现代科学和技术生产才能提高国货的品质”——那代人“爱中国”、“救中国”、“强中国”的愿望无疑是真诚强烈的。只是仅仅几十年后面对“国货”中除了各种

奇形怪状的添加剂几乎一无所有的食物清单，中国人的表情无疑更是尴尬苦涩乃至必须重新选择的。

“改采新的科学方式”的追求贯穿在蒋廷黻生活的各个层面，包括“真能代表中国伟大的过去的”北平（北京）对于“要建设工厂，改善国家，救全世界的人说”实在不是个“理想城市”——此语出自一位历史学者眼眸，在今日听来无疑是触目惊心的。但这一切又并非“实业救国”、“科技兴邦”的错：

中国在1928年有足够的爱国分子。问题是：单凭爱国热忱是无法阻遏一流强权侵略的。二十世纪是民族爱国主义盛行的时代。人人都是爱国的。所不同的是各国间工业、教育、卫生和福利事业发展的程度不同而已。……军政两界的爱国分子都认为工兵厂、铁路、出超的贸易是强国的条件。但是，他们忽略了健康、受过教育、能做事的人民才是强国的基本条件。

这话实在放在今天来讲也恰如其分。素有中庸之美节制之用、追求举动“中节”的中国不得不在近代以来重新培养理性而警惕狂热，虽然悲哀，此原本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基本的“素质教育”。例如1930年代的中国“人民在理智方面都晓得国家没有作战准备，但在情感方面，大多数均主张早日抗战”。1928年的蒋廷黻还居然稀奇地提出了一个我们当下还在热炒的问题：“中国正致力于保存其固有的历史文化。在民族文化方面，目前的中国是古代中国的延续。在这方面，中国与希腊、罗马、埃及、巴比伦以及大部分阿拉伯国家截然不同。”八十多年后，“现代化”这只怪兽已经在表象上吞噬了“古代中国”，而在骨骸上我们很可能更加一无所有。1935年身在英国牛津的蒋廷黻说得好：

那儿的古代遗风和我的家乡一样，但也无碍于现代的生活。我们中国人无法避免新旧两个极端。有时候人们认为我们先人思想已经完全成熟，因此我们现在这一代用不

到多批评。有时人们认为现在什么都不对劲，这完全是过去人们思想行动错误所造成的。过去是一条束缚的铁链，我们必须把它挣脱。但英国人与我们不同，他们知道如何嘲笑伟大的过去，同时也知道如何珍视过去。

“中国对人的管理一向是依靠道德理想主义的。就人性好的一面说，可以得到某种程度的成功。但也有危险和限度。理想主义可能成为空口说白话，也可能被现实的想法所代替。除非我们能揭过去的短，我们就不能进步，就不能生活得更理想”，这话听来何其智慧。蒋廷黻并不“太恨殖民与帝国主义”不等于他蔑视自己的民族，1929 - 1934 年间短暂的和平建设时期让他深深赞叹“中国人在平时的进步的能力”。只是战乱依然一场接着一场。

蒋廷黻在他的“四十不惑”之年（1935 年 12 月）准确地选择了“弃学从政”，这使他在现代中国颇成为一个争议人物，尽管他终生都认为“清华五年”才是他“最快乐的岁月”，毕竟彼时清华学子“大多数都是一本正经的，他们深深了解对国家的责任”。而他的湖南同乡兼有师弟之谊的著名史学家吴相湘先生多年之后言及于此依然相当激动，以为世人又难以尽知蒋氏苦心者。

1930 年代蒋廷黻与丁文江在《独立评论》上一起主张“新专制主义”——似乎这一幕依然在今天的中国重演，并非一个“左右”或“新旧”、“保守”或“激进”就能交割明白。“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冲突与权衡似乎是较为婉转的表达。洋博士率先“向内转”寻求传统资源例如“类帝制”权威的支持在太阳底下也根本不是什么新鲜事。然而蒋廷黻如下感慨又何尝没有相当的思考：

由于中国对现代政治组织和宣称鼓动方法不大熟悉，不能妥善运用，因此，在政治方面所表现者也和其它方面一样，西方民主政治的弊端首先传入中国。我们是否应该建议那些热衷政治的青年，要他们牺牲一切，去醉心政治，去推翻某个政府或打倒某派？又是否应该告诉他们救国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很长时间，要他们安心读书，以应未

来的需要？在混乱的中国，这些问题都不是应该单纯的答案所能解答的。

毫无疑问的是蒋廷黻原则上并不反对“政治民主”，与认为“民主的弊端能用更民主的方法去防止”的胡适不同，注重“中国人的贫困是个迫不及待需要解决的问题”的蒋廷黻自然而然会更倾向那些“立竿见影”的选择。例如面对北平的国会议员出卖选票给无知而枉法的曹锟选其为总统，或者湖南省议会开会时议员都把时间浪费在争权夺利上、致使人民感到厌恶、认为有它反而不如没有它——类似的抱怨民初的许多政治人物例如熊希龄都发出过，甚至“窃国大盗”袁世凯也在抱怨有了国会反而“办不动事”。似乎一切都依然在关联那个古老的申诉：政治人的德性问题。

蒋廷黻少年就读的明德学校的创始人胡元倓先生，尝对好友黄兴感叹“养成中等社会，实为立国之本图，惟其事隐而难为；君倡革命乃流血之举，我为此事则磨血之人也”。更在另一好友谭延闿病逝之后复叹“后死者”之难：

良友徂逝，边患日深，三十年前以教育救国之志，未得少酬，不知藐躬热血尚堪更磨十年否也？！然身苟幸存，敢忘死友？国犹未破，事尚可为！（《耐庵言志诗》第三集“自序”）

如此“诚心实力，有错无私”（胡之从兄元常为书联语），似乎道出了彼时某种湖南精神的集体追求。“耐庵”之“耐”，无妨就是“耐烦”之“耐”。谓予不信，且看蒋廷黻如下表态：

我以为我们要首先改革我们的人生观，圆滑、通融、敷衍，以及什么消极、清高，都是该打倒，我们要做事。吃苦要做事，挨骂也要做事。官可不作，事要做。别的可牺牲，事业不可牺牲。做事的人，我们要拥护，要崇拜。说便宜话的人，纵使其话说得十分漂亮，我们要鄙视。

许纪霖先生在《瓷器店中的猛牛》一文说蒋“在他从不诉苦的